

# 目标设定、路径选择、队伍建设： 新时代汉语国际教育的重新认识<sup>\*</sup>

胡范铸<sup>1</sup> 陈佳璇<sup>2</sup> 张虹倩<sup>3</sup>

<sup>1,3</sup>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 <sup>2</sup> 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提要** 语境制约行为,目的决定过程。在新时代语境下重新考察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以汉语的国际教育推进跨文化理解、跨文明互鉴、“民心相通”,进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考察新时代汉语国际教育的路径,就需要从以教育者为中心转向以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共识为中心,从以语言教学为中心转向以语言教学和语言服务结合为中心。而要满足这些要求,就意味着对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属性和队伍建设应按“汉语+N(多种学科)”的思路加以重新认识。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 命运共同体 获得感 汉语+N

DOI:10.13724/j.cnki.ctiw.2018.01.001

何为汉语国际教育?汉语国际教育何为?通常以为这是很明确的问题,其实未必。语境制约行为,目的决定过程。本文将从对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重新认识开始,讨论新时代汉语国际教育的路径选择,进而分析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属性和队伍建设。

## 一 共同体: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指向

汉语国际教育的高速发展有目共睹,但对于这一发展的目标和价值的理解似乎还并没有达成普遍的社会共识:国外的“中国为何要如此费力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文化侵略”猜忌此起彼伏,国内的“为何不把如此巨大的经费投向自己的教育”的“胳膊外拐”疑惑也从未消除;即使在汉语国际教育界本身,对于“何为汉语国际教育”“汉语国际教育何为”也尚未形成自觉的核心理念。这无疑制约了我们未来更好发展的可能。

何为汉语国际教育?一个最简单的认识就是“教外国人汉语”,比较严格的说法似乎就是“面向外国的汉语教育”。汉语国际教育何为?最为简明的说法就是“传播汉语、传播中国文化”。不过,这样的解释显然既无法有效回应国内的“胳膊外拐论”的质疑,更难以有效回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条件下政治传播与国家形象修辞案例库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6BZZ001)、新疆自治区社科研究基地项目(XJEDU040716B02)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应国外“文化侵略论”的诘难。

对此,胡范铸、陈佳璇(2011)曾针对“汉语教育教什么”的问题,提出:“决定‘教什么’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为什么教’”,而“我们为什么教汉语?”“首先就是促进世界和平。语言是沟通的最好的工具,是构筑世界和平的最好的工具,也是构筑多元文化理念的最好的工具。”“汉语国际传播的核心是让世界、让西方世界真正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的核心是什么?这种价值观也有它的依据,也有它的合理性。”这一认识试图走出“为汉语传播而传播汉语”“为文化传播而传播文化”的某种话语模式,不过还显得比较空泛,因此也就很难获得足够的回应。

胡范铸、刘毓民、胡玉华(2014)开始明确提出:“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或曰‘汉语能力获得’,或曰‘交际能力建构’,或曰‘经济利益实现’,或曰‘中国文化传播’,种种认识,似乎都有价值。不过,由此也带来诸如‘如何处理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目标之上是否还有更为重要的目标?’‘贯穿这些目标之中的核心又是什么?’等一连串问题。应该说,汉语国际教育不但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教学,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传播,不应该只是希望由此拓展中国经济实力或提升中国国际政治地位。

汉语国际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语言能力训练而展开的‘国际理解教育’,是一种可以影响‘情感地缘政治’的过程,它应该是造就国际社会情感沟通的重要力量。”并由此指出,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也许可以定义为五个层次:“汉语能力获得——交际能力建构——经济利益实现——中国文化传播——中外社会互动”。其中,“汉语能力获得”只是一个前提性、基础性的条件,根本目标应该还是“中外社会互动”。而在这一多层次的目标体系中,贯穿始终且不断强化的核心应该就是“情感沟通”。这一认识基于“国际理解教育”和“情感地缘政治学”而展开,但对于目标与路径的讨论还是没有充分展开。

直到张虹倩、胡范铸(2017)才进一步确定了这样的认识:“基于全球治理的视域,孔子学院的建设、汉语的国际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路径,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指出:“共同体”和“社会”相关而不同,虽然都属于人类共同生活形式,但“共同体”指的是“真正的共同生活”,而“社会”可能只是“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共同体”是人类出于“本质意志”(wesenwille)的有机团结,它体现了人类关系的真正本质;而传统意义的“社会”则是依赖权力、制度、法律等“选择意志”(kforwille)形成的机械团结,体现的是人类关系的表象。(滕尼斯,1999:154)

“命运共同体”是“命运”与“共同体”的一种内在精神组合和有机联系。早在2013年,中国政府便宣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2014:272)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更明确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为十四大“治国方略”之一。这也是国际关系史和世界政党史上一个大国一个大党第一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为自己的政治纲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全球发展的现实要求。当今世界,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另一

方面,“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习近平,2017:58)其中,尤其是互联网的空前发展,不仅深刻改变了作为社会运行基本条件的信息生产方式、信息流通方式与信息消费方式,同时也深刻改变了社会的层级结构与地缘关系。“在这一语境下,‘全人类参与’与‘全球化治理’究竟如何展开,第一次已然成为一个极具现实性的问题。”(胡范铸、周萍,2017)通过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模式来解决全球性问题,已成为全球的共同需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新时代“中国崛起”的题中应有之义。信息流通的全球化、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人员交通的全球化,不但决定了任何社群再也不可能只是一种孤立的存在,更意味着空前加重了大国权益与全球共同权益的关联,加重了大国责任与全球共同责任的关联。中国目前就人口而言世界第一,就国民生产总值而言已成为第二大国,就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言已连年达到30%以上。没有中国的发展,全球的发展将严重受挫;而没有全球的发展,中国也不可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因此,“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责任’就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话题。”(胡键,2007)中国有责任为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目标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2017:58)。这五大目标构成了一个宏大的目标体系。在这其中,“持久和平”无疑是第一位的、基础性的目标。而要达成这一远大的目标体系,最重要的“路径选择”便是“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习近平,2017:60)。而这“五通”的“核心问题”我们以为便是“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的前提是语言相通,西方文明中有所谓“巴别塔”的传说。据《圣经·旧约·创世记》的叙事,人类曾经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只采用了一个策略“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就使得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通天塔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这一故事正是语言相通对于民心相通的重要性的最简单而明白的揭示。

语言相通的基本路径无非两条:一是改变交流内容的语言形式,也就是借助翻译;二是改变交流者的语言能力,这就是二语学习。<sup>①</sup>

不过,“语言相通”本身并不直接保证“民心相通”,因为人类历史上固然不乏“语言战争”(不同语言集团之间的战争),更多的却是非语言的战争。这就要求在构建“语言相通”的同时就自觉地指向彼此的“民心相通”乃至“共同体”意识,这也就是“国际理解教育”。

所谓“国际理解教育”就是以“国际理解”为理念而开展的各种教育活动的总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52年就已提出:国际教育的任务是“解释人类文化差异性的原因;说明人类文明来自于各个民族共同的贡献;证明人类进步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强调各个民族都负

<sup>①</sup> 为了更多地实现广泛的“民心相通”,我国各大外语院校纷纷启动了空前规模的小语种建设工程。这一工程自然有其价值,不过也有其明显局限,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开全所有的小语种,这不但受到师资限制,也受到就业市场的限制。但是,对各种母语为小语种的学生进行汉语教育却是现实而可行的。语言人力资源不在于“为我所有”,而在于能够“为我所用”。

有合作的责任;指出国际协议的履行需要人类共同的意志;倡导教育成为国际社会达至世界大同的必经之路;培养年轻一代的和平文化意识;培育年轻一代的国际理解与合作精神。”(转引自王涛,2009)此后更进一步提出“国际理解教育”的口号,强调“将事实上的相互依赖变成有意识的团结互助,是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为此,教育应使每个人都能够通过世界的进一步认识来了解自己 and 了解他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

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能否理解世界、世界能否理解中国直接决定了国际社会“全球理解”的可能。由此而言,汉语国际教育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教学,不应该只看作是“在国际上开展”的“汉语教育”,向国外传播“汉语”以及附着于其中的中国文化;更应该看作是“汉语/国际教育”,是“运用汉语进行”的“国际教育”,是一种运用汉语教育增进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区域、国家、地区的人们之间相互了解与相互宽容,加强各自之间相互合作,以便共同认识和处理全球社会存在的重大共同问题的国际理解教育,是“以语言交流为纽带,以文明互鉴为平台,努力成为增进友谊的桥梁、合作共赢的推进器”(刘延东,2017)。

在这里,汉语的传播过程无疑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播,但“传播中国文化”只是汉语国际教育的“效益”之一,并非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语言交流”的目标不是单一方向的“向对方传播中国文化”,而应是“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也就是说,汉语国际教育就是以汉语的国际教育推进跨文化理解、跨文明互鉴,由民心相通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进而推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一种努力过程。只有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习近平,2017:25),才能既有效回应“胳膊外拐论”的质疑,更有效回应“文化侵略论”的诘难。

## 二 获得感:汉语国际教育的路径选择

既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全球治理为路径,“全球治理”以“民心相通”为基础,“民心相通”离不开“国际理解教育”,汉语国际教育正是国际理解教育的组成部分,则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汉语国际教育何为?

### (一) 从以教育者为中心转向以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共同意愿为中心

基于“传播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理念的汉语国际教育是以一种以教育者为中心的活动,关注的首先是教育者的利益;而基于“以汉语传播为路径促进命运共同体构建”理念的汉语国际教育则意味着是一种以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共同意愿为中心的活动,关注的首先是受教育者的“获得感”。这就要求:

其一,以受教育者的情感需求为中心。学习不是“文化置换”,学习他国文化不是用他国文化置换自我的文化,而是构建一种互文性的、主体间性的文化关系。在社会交往中,几乎绝大多数人首先更愿意做的是“诉说”而非“听说”,人们之所以能够结成“好友”“闺蜜”,首先就在于寻找到情感上“互相诉说”的对象,跨文化交流尤其如此。由此而论,汉语国际教育的成功首先不在于让受教育者能够“用汉语听说中国故事”,而是“用汉语述说受教育者(社会)的故事”。

我们应该明确告诉全世界:传播汉语并不是为了输出中国文化,而是为了与世界分享各自的文化。分享,不是仅仅向对方传播,而是同时也向对方学习;同样,学生学习也不仅是为

了接受中国文化的传播,更是为他们向中国介绍他们的文化创造机缘:学习汉语首先不是为了听中国人讲故事,而是向中国人讲故事,“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们的故事,向13亿中国人讲故事将使得你们的故事真正成为全人类的故事”。这样,不但将有效避免语言传播中普遍容易产生的“文化侵略”的疑虑,更可以激发受教育者的情感认同。<sup>②</sup>

其二,以受教育者的知识需求为中心。以受教育者为中心不等于“不讲中国故事”,而是说,我们所讲的中国故事要能够回应国外汉语学习者的“知识困惑”。有调查显示:外国人最爱问的问题是“中国会是专制国家吗?”“中国政府为什么只准生一个孩子?”“中国在用武力威胁东南亚国家吗?”“中国人真的吃狗肉吗?”“中国人为什么都数学好?”“中国人都不信仰上帝吗?”等等。(周鑫宇,2017:11)对于此类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常常采取的是一种鸵鸟政策,而不是给予明确的回答和认真的讨论,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其三,更重要的是以受教育者的发展需求为中心。对一个社会来说,“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而对一个个体来说,教育则是“人力资本”的建构过程。中国的英语学习之所以全民性“自我动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英语的学习能够有效地使得学习者的“人力资本”明显增值。二语学习对于绝大多数学习者来说不是“文化猎奇”的助手,而是自我成长的帮手。汉语国际教育同样必须注意克服只关心如何满足“文化猎奇者”的需求,而忽视借助汉语的学习帮助学习者个人发展的问题,提升其就业机会,拓展其上升空间。

## (二)从以语言教学为中心转向以语言教学与语言服务结合为中心

基于“传播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理念的汉语国际教育是以一种以“语言教学”为中心的活动,关注的首先是如何完成“教学大纲”的任务;而基于“以汉语传播为路径促进命运共同体构建”理念的汉语国际教育则意味着是一种以语言教学与语言服务结合为中心的活动,关注的首先是由汉语教学完成了什么“社会服务”。这就意味着:

其一,从“对当地人教育”转向“为当地人服务”。汉语国际教育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当地人进行汉语教育,而是更要着眼于为当地人民的福祉和社会发展服务。这不仅意味着要注意借助汉语的学习帮助学习者个人发展,提升其就业机会,拓展其上升空间,更意味着要推进当地社会的发展,让当地社会有“获得感”。如在缺医少药的非洲地区,也许首先需要考虑将汉语国际教育与基础卫生培训结合起来;在“一带一路”工程拓展地区,也许首先需要考虑将汉语国际教育与机械操作培训结合起来;在高度依赖旅游经济的地区,也许首先需要考虑将汉语国际教育与导游培训、民宿管理指导结合起来。<sup>③</sup>

其二,从只注意教汉语转向同时注意为在当地的中国人的工作与生活服务。汉语国际教育,不仅仅要让所在国的人民有获得感,也要让中国的人民有获得感。这不仅仅包括因为语言教育而使得中国的海外企业更容易招聘到合适的当地员工,更包括因为汉语的国际教育而使得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人切实感受到了生活的便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开放,中国人出国留学、访亲、旅游已经成为非常普通的生活方式,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

<sup>②</sup>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叶澜老师因讲授汉语时注意导入留学生祖国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和话题作为课堂内容而受到特别欢迎,或许可以作为一个例证。

<sup>③</sup> 第一个进入中国的传教士罗明坚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中国肇庆开设第一所教堂“仙花寺”(1583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帮助治愈了肇庆知府家人的不育症。

的旅游客源地。而海外游历生活的质量,也就成为中国人生活质量的一个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使中国人在世界各国感受到更多的语言便利,无疑是中国旅游管理向全球管理延伸的重要路径,也是提升中国百姓国家自豪感和社会发展“获得感”的有效路径。<sup>④</sup>

语言也可以成为一种“公共产品”,增加汉语“公共产品”的供给,由此也促进其他产品消费。没有消费便没有制造。语言消费带来的语言就业才可能真正有效促进汉语教育。

### 三 汉语+N: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特性和队伍建设

既然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是“以汉语传播为路径,推进国际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加学习者的获得感,增加当地人民的获得感,也增加中国人民的获得感,那么,对于现有的汉语国际教育的师资队伍结构乃至学科归属也就不能不重新加以认识。

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性质如何确定一直聚讼不已。

就学界意见而言,尽管对于汉语国际教育的研究或从语言学出发,或从教育学出发,或从心理学出发,或从传播学出发,甚或从政治学、经济学出发,但对学科属性的认识基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为属于汉语言文字学,一是以为应归属于语言学学科下的“应用语言学”(包括认为应归属于国际上通行的“第二语言教学”学科),一是以为应归入教育学。即使主张汉语国际教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或是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理论的“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的,就其论述的基点看,最后其实还是落脚于“汉语言文字学”“应用语言学”“教育学”其中一部或几部。(参见崔希亮,2015)

就学位管理体制而言,目前“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归在“中国语言文学”这个学科门类(2012年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汉语国际教育,代码 050103”归属于“文学门类,代码 50”下位的“中国语言文学类,代码 0501”),硕士专业归属于“教育学”(“汉语国际教育,代码 0453”作为专业硕士学位与“教育学,代码 04”门类相关),博士专业归属于“中国语言文学”或“外国语言文学”。(参见崔希亮,2015)

这一学科属性认识和学位管理体制的混乱,一般以为是一个难以忍受的问题。我们以为,这其实既揭示了某种困境,也提示了某种价值。这就是不但逼着我们思考,“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基础到底是什么,也许还可以倒逼我们思考如何跳出传统学科分类的藩篱。

如前所述,我们认为:“汉语国际教育”并不能够仅仅理解为“汉语(国际)教育”,即“在国际上教汉语”;而应该理解为“汉语/国际教育”,即“用汉语开展的国际教育”。“汉语/国际教育”离不开“汉语(国际)教育”,但绝不限于“汉语(国际)教育”,而是必须指向更高的价值目标。汉语的使用人口已经拥有十多亿,如果仅仅是一般性意义上的“二语教学”,我们无法回应何以在国内乡村教育存在巨大缺口的条件下每年还要只为一两百万的海外“汉语学习人口”就投入数亿美元<sup>⑤</sup>;也无法解释何以学界会只对“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属性而不对其他二语语种教学的学科属性如此争论不休。这只有将汉语国际教育置于全球治理,置于构建“民

<sup>④</sup> 如意大利都灵大学孔子学院组织师生为当地各种展览馆翻译中文游览说明,不但推进了汉语教学,也大大方便了来到都灵旅游的中国游客。

<sup>⑤</sup> 根据 2016 年《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孔子学院当年拥有各类面授学员 155 万,网络注册学员 59.7 万。而该年孔子学院年度经费为 314,116,000 美元。

心相通”的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才可能获得理解。

“汉语国际教育”是“汉语”+“国际理解教育”，这“理解”牵涉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由此而论，“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其实就应该是一种“汉语+N”的学科。

这里的“+N”很容易被人理解为就是“+中国文化”。其实不然，它可以是“+中国文化”，也可以是“+中国经济”“+中国社会”，还可以是“+医学”“+法学”“+行政学”等等各个学科。即使是“+文化”，其中的“文化”也不应该如目前通行的理解为只是“太极拳”“唱京剧”“剪窗花”等等，“文化”包括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器用文化三个层面，“汉语+文化”不能只是停留在器用文化上，而应该更深入到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层面。否则，既很难适应海外汉语学习者的“知识需求”，也很难适应其“发展需求”，更难适应“构建共同体”的需求。

其实，在我们不停地为“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属性纠结的时候，国外高校自主组织的“汉语教育”早就体现了“汉语+N”的学科特质，他们的汉语教学者往往不但是汉语的专家，同时还是中国哲学专家、东亚经济学教授、国际政治学博士，而他们所在的机构，或者是“东亚系”“东方学院”，或者是“商学院”“国际问题研究院”，很少有纯粹的“汉语言系”或者“汉语言文学系”。以至于常常出现这样的尴尬，西方的汉学家与中国国际汉语教育学者讨论中国问题或者国际问题时，只是接受了“汉语+教学法+跨文化交际”训练的中国学者多半只能无言以对。<sup>⑥</sup>

“汉语国际教育”是一个专业，关于这个专业的学科属性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的认识影响了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崔希亮，2015）尽管我们对于“培养目标、培养规格”的具体内容与现有的普遍认识并不一致。

我们以为，多年以来“汉语国际教育”的人才培养只是注意“汉语+语言教学知识+（些许）跨文化交际知识”的知识模型应该改变<sup>⑦</sup>，应该注意大力引进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哲学、生态学、医学、建筑学等各学科的硕士、博士，更可以“双学位”等形式，造就一大批真正具有“汉语+N”知识结构的教师队伍，这样才可能有效践行“以汉语国际教育为路径，推进民心相通，推进全球治理，推进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目标。

当然，“汉语+N”中的“+N”并不能简单地就等同于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哲学等学科本身的研究，而应该是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国社会基础和可能路径”对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哲学等问题的重新思考。这一重新思考并不限于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也应该包括对世界尤其是汉语学习者国家相关问题的思考。特别是对外派的汉语国际教育教师来说，在教汉语的同时深入学习、研究所在国的社会、文化的某一问题，不仅是个人学术成长的方便之门，更是汉语国际教育的任务之一。如果没有向世界各国的更深入的学习（研究），没有对于世界各国更深入的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很难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更是难以实现。汉语国际教育处于“民心相通”的第一线，教师责无旁贷。

<sup>⑥</sup> 有研究中国汉代文献和明代社会的意大利博士生参加“新汉学计划”来到某985高校对外汉语学院，发现根本找不到可以对话的，因为学院的教授与博士从未研究过这类问题。

<sup>⑦</sup> 毋庸讳言，近年来汉语国际教育的学位论文低水平重复现象远远高于大多数学科，这不能说与这一学科目前的训练模式没有关联。

汉语国际教育的“汉语+N”的结构或许可能倒逼我们对于学科分类传统认识的调整。日本一些高校开设有“社会系统”专业,包括但不限于我们称之为国际关系、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乃至宗教学的各种学科,这一设计也许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不无启示。其实,不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借助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得到拓展,即使是生态学、医学、建筑学等学科也同样可能基于目标的重新设定而有所发展变化。<sup>⑧</sup>

新时代汉语国际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是在国际政治大背景和负责任大国条件下,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路径,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推进人类和平发展的自觉努力。这样的事业,既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汉语教育,也不同于英语的国际教育,更不同于当年的传教士二语教育、殖民者二语教育,因此,我们的实现路径和学科建设需要借鉴却不应复制其中任何一种。这既给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提供了话语体系创新的可能。

### 参考文献

- 崔希亮 (2015) 关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定位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 3 期。
- 胡范铸、陈佳璇 (2011) 基于“国际传播”概念的汉语国际教育,《国际汉语教育研究》第 1 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胡范铸、刘毓民、胡玉华 (2014) 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与核心理念——基于“情感地缘政治”和“国际理解教育”的重新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 2 期。
- 胡范铸、周萍 (2017) “学术文摘”主持人语,《社会科学报》6 月 29 日。
- 胡键 (2007) “中国责任”与和平发展道路,《现代国际关系》第 7 期。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6)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 刘延东 (2017) 第十二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上的讲话。
- 滕尼斯 (1999) 《共同体与社会》,林荣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涛 (2009) 二战后的国际教育——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与未来,《外国教育研究》第 1 期。
- 习近平 (2014) 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2013 年 3 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
- 习近平 (2017)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 张虹倩、胡范铸 (2017)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汉语国际教育及孔子学院建设:问题、因由与对策,《社会科学》第 10 期。
- 周鑫宇 (2017) 《中国故事怎么讲》,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

---

<sup>⑧</sup> 一向不受重视的某医学院受到大量自费来华学医的发展中国家留学生的鼓励,拟将该校改为“热带医科大学”,以争取在国内医学界独创一片自己的空间,这也许正可以看作“汉语国际教育+N”对于国内高校改革的反推。



## Target Setting, Path Selection and Team Construction: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Hu Fanzhu Chen Jiakuan Zhang Hongqian

**Abstract** The context restricts the behaviour and the target determines the proces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e targe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hould be promoting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s, and in turn giving impetus to the building of a human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Therefor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needs to change its educator-centered practice to center on a consensus among the educator and the educated, and shift the focus from language teaching 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language teaching with language service. To meet these requirements, the subject attribut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its team construction should be designed as “Chinese+N”, where N indicates various discipline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sense of gain, Chinese+N

### 作者简介

胡范铸,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主任,《当代修辞学》编委会主任,新疆“中亚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中国修辞学会执行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修辞学、传播学、思想史,发表论文近 200 篇,著有《幽默语言学》(1987)、《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1992)、《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理论 方法 案例》(2017)等学术著作。[Email:hufanzhu001@126.com]

陈佳璇,广东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汉语国际教育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修辞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等。发表论文 30 余篇。著有《社会语用学案例研究》(2012)等学术专著。[Email:jiakuanchen@163.com]

张虹倩,华东师范大学“晨晖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修辞》编辑部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修辞学、社会语言学、文献学。发表论文近 50 篇。著有《多学科介入下的修辞分析》(2017)等学术著作。[Email:zhanghq711@126.com]